

第十四章

围困长春

兵临城下

到达哈尔滨之后，我们先参加了东北局省委联席会议。会议着重总结检查了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以期进一步发动群众，巩固地方政权，扩充兵源，准备迎接新的战斗。此时，在东北战场上，我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七十万，地方部队三十万。解放区的面积已占整个东北地区的百分之九十七，人口占百分之八十六。而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兵力则下降到四十八万，地方军七十万。东北敌军依据蒋介石“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确定了“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指北平至沈阳的铁路线）的指导方针，并作了如下的兵力部署：以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率领第八、九两个兵团约三十万人，防守沈阳地区；以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两个军约十万人，防守长春；以“剿总”副司

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第六兵团等部四个军约十五万人，防守锦州、锦西地区。

会议指出，一九四八年的任务是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这个任务怎样完成？会议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后又多次讨论，中心问题是打不打长春，怎样打长春？

长春位于东北的腹地，是贯通京哈、长图及东北境内各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伪满洲国就曾建都于此，称之为“新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东军”占领时期起，就在城内街道及近郊区做了许多永久性、半永久性的工事。特别是市中心的主要大楼和主要街道间，都有钢筋水泥的地下坑道连接。国民党进入长春后，进一步加强并增修了不少工事，使长春成了一个有着坚固的防御体系的大城市。一九四七年我东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攻势以后，长春虽然已丢在了我们的后方，但敌人仍配有较强的防守力量。一九四八年初，敌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来到长春，组成第一兵团。三月，敌六十军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仓惶退出吉林，进入长春，与蒋军嫡系部队新七军分守长春东西各半部。这样，敌人在长春的兵力就有新七军、六十军以及收编的地方杂牌部队共约十万人。敌人所以要困守这样一个孤城，一是处于形势所迫，不得已；二是舍不得丢掉这个可以向我东西南北满进攻的战略“宝地”，想在我们的腹地按上一个钉子，牵制我军主力，等待

形势的转变。

三月十二日，罗荣桓同志就东北的形势和任务问题作了报告。他指出，从夏季攻势以来的十个月里，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彻底改变了局面，由劣势转为优势。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东北局的“七七决议”确定了明确的方针，我们一万二千干部下乡，土改基本完成，由于我们关内关外的同志一致势力，加上华东战场连续胜利，牵制了敌人不能北调……这些都是改变形势的重大因素。目前，敌人后备力量有限，大量增兵东北已不可能，蒋介石进退两难。罗荣桓说，我们的对策方针：一是切断退路，一是围困敌人，最后达到歼敌的目的。早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央军委、毛主席曾电示东北局，“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四八年二月十八日，又电示说：

“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但当时林彪并没有执行中央的这一正确的决策，而准备先打长春，或围点打援，而后一步一步地向南推进，解放东北。所以，从四月份开始，东北军区总部召开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问题，解剖分析了四平等城市攻坚战例，为强攻长春，进而解放全东北作思想上、组织上、战术技术上的准备。四月十八日，林彪将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报给军委，计划从五月份开始，集中九个纵队围城和打援，以

新成立的三个纵队和独立师，在沈阳与锦州、沈阳与四平间沿途牵制敌人。在完成攻击准备之后，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争取用十天半月的时间结束战斗。四月二十二日，军委、毛主席给东北局来电，一方面同意了打长春的意见，一方面也批评了林彪多次陈述的打沈阳、锦州、榆锦段以及入关作战困难的思想。五月中旬，军事会议结束。为了下一步的作战，东北局决定成立两个前线指挥所：一个是第一前线指挥所（以后又叫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以原辽东军区机关为基础组成，准备指挥攻打长春。当时还印发了长春市区敌分布图、敌工事图等军用地图；另一个是第二前线指挥所，以原冀热辽军区为基础组成，负责指挥北宁线方面作战。两个前线指挥所不辖部队，由东北军区总部根据任务的需要配属部队。这两个前线指挥所也就是以后东北的第一、第二兵困的前身。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在太阳岛休息了几天，与肖华一起离开了哈尔滨。中途在面安还碰到三纵队的罗舜初、韩先楚同志，他们正奉命向伊通集结，准备攻打长春。回到通化以后，即整顿辽东军区机关，将一部分人员和装备补充了安东军区和其他部队，本着精干的原则，把原辽东军区机关的架子带到了长春外围。指挥所开始设在长春市东南四、五十里的李家屯，留守处在吉林。这时已是五月下旬。在我们去长春之前，除了围城的主力部队以外，周保中、陈奇涵、陈正人、陈光同志率吉林军区（即东满军区）

和松江军区各一个前指，参加了围城工作。我们去了以后，这两个前指都派了一些同志来，共同组成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我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陈光、陈伯钧任副司令员（陈光同志不久调离），解沛然（解方）任参谋长，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此时，长春外围战役已结束，郑洞国及其十万敌军已被我一、六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团团围住。五月二十四日，为了对空实行封锁，打断敌人空中增援和撤退的道路，我围城部队向长春西郊最大的飞机场——大房身机场发动了猛烈进攻，歼灭了敌人的守备部队。我们占领机场后，在水泥跑道上埋上炸药，炸了好几个大坑，将跑道破坏，接着严密布防，控制了机场。记得长春解放时，郑洞国问我：

“你们炸机场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你最清楚了，还用问我吗？”这一仗以后，部队基本处于围城待命状态。六月，东北局向我们下这了“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打长春的总方针、总任务，变短时间内大兵团强攻为以小部分主力与独立师久困长围的方针。以后我们得知，在攻打长春方针的攻变过程中以及在锦州战役之前，中央军委、毛主席连续发了一百多封电报，督促林彪率主力及早南下北宁线作战，切断东北与关内的联系，造成关门打狗之势。而林彪始终犹我犹豫，最后在中央的一再批评教育下，才执行了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实践证明，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是党中央、毛主席着眼于全局、决胜全局的关键

性的一着棋。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方针也是完全符合对当地的客观情况的。

六月十五日——二十日，我围城指挥所在吉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调整围城部队，全面部署围城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决定解放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并决定一、六纵队后撤整训，以十二纵队三十四、三十五师、六纵十八师以及六、七、八、九、十五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团为围城部队，进行接防。当即发布命令：“为保卫攻击长春的战略任务，决定对长春进行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围困。总的任务是：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进出，控制机场，不使敌人空运，扰乱敌机空投，并积极歼灭出扰敌人，寻夺敌之弱点，逐步压缩敌人，完成攻城战场之各项准备……”对围城部队的各师，均布置了具体任务。为指挥及时、便利，以长春东北的伊通河及长春西南的孟家屯火车站为分界线，将围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地区队。独六、独八、独九师为东地区队，十八师为其机动部队，统受围城指挥所直接指挥；独七、独十师为西地区队，十二纵西个师为该地区的机动部队，由十二纵首长直接指挥。六月二十二日前所有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于是，十万火军兵临城下。

长春围困战役就这样拉开了战幕。在长春城外方圆五十里的地面上，形成了一个封锁区。我十万围城部队，筑

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蒋军十万成了“瓮中之鳖”。

铁壁合围

“瓮中捉鳖”并非易事。此时驻守长春之敌约十万之众。其中西半部的新七军，是曾骄横一时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所谓“远征军”、“王牌军”之称；东半部云南滇系的六十军，到东北后虽屡屡受挫、士气不高，但还有相当的实力；其余那些东北的地主武装、土杂顽匪改编的部队，也非常反动。这些敌人，只要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就决不会放下屠刀，而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垂死挣扎。因此，我军实行久困长围的方针，首先是以军事斗争为手段，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

对长春这个有美式装备的敌人守备的城市实行围困，对我军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敌我双方碉堡相对，在宽大正面上我与敌短兵相接，斗争十分严峻。由于我们经验甚少，在斗争中边摸索、边总结。开始就力争把工作做得细致一些，准备得充分一些。完成封锁圈后，部队即行构筑工事架设通信网，勘察地形地物，侦察敌外围据点，做反突围方案。为了防止敌人突围和出击，围城部队作了纵深梯次配置。在第一线阵地上构筑了较坚强的工事，围城部队依托工事反击敌人的冲击。第二线阵地也构筑了工事。尤其是在封锁机场的阵地上和西铁路口敌主要的突围方向上，

部署了战斗力较强的兵力。在纵深有利的地域控制了机动部队，一旦敌人突破我前沿阵地，就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六月二十八日，围城指挥所发出“交通通信工作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强工事，挖交通壕。除了有环城交通沟保持各部队之间、各部队与指挥所之间的联系外，各部队都有伸向前沿的壕沟，形成了一个地下交通网。从地面上看似乎是一马平川，不见我军一兵一卒；但地面下，却是千军万马，严阵以待。交通沟的最前沿，距敌不过百把公尺，连敌人吃的什么饭都可以看见。通信网也相当可观，环城架设两道电话线，一道在封锁区内侧，一道在封锁区外侧。各部队与前沿阵地都有电话联络，指挥畅通。当时围城的目的是为了攻打。一是准备打敌人的突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二是准备将敌围困到山穷水尽之时，再行强攻。因此我们对长春敌人的城防工事和部队情况做了非常细致的侦察。六月三十日，围城指挥所发出“侦察工作的指示”，各部队的首长亲自动手，从部队、群众、俘虏三个方面，对长春敌外围据点和长春域内的情况进行全面侦察，绘出要图，因地制宜地作出战斗方案。后来，还研究整理成一本“长春匪情汇编”的小册子，并绘制了大量的军事地图。长春解放后证实，我们的这些侦察材料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当时，城里敌人有什么动向，我们这里马上就可以知道，情报来的很快。现在想来，我军的司令部工作在当时已具有了相当水平，是很值得称道的。

围城之初，敌人还比较嚣张，小股部队经常出来袭扰、抢粮，准备固守。后来，大概越来越感到固守孤城是坐以待毙的下策，于是就开始做一些试探性的突围，有几次还有相当的规模。对于出扰之敌，我们的方针是：“如果在一个师以下，就原阵地迎击粉碎；如一个师以上，则诱敌深入，抓住敌人，使用机动部队歼灭之”。七月一日，围城指挥所在李家屯召开纵、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的问题，特别发出指示，加强各结合部的封锁，还根据情报，制定了打敌人向西或向南突围的预定方案。七月三日夜，敌以小部队向我独十师各团阵地出击被我击溃。另一路经丁家窝棚向我出击，但由于其尖兵班集体投诚，其他部队不战而退。四日凌晨，敌由火磨公司出动约一个团的兵力，向我独七师谭家营子阵地进犯，冲锋三次均被击退。六日拂晓，敌人用五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我西南、正南和东南阵地出击。西南方向的孟家屯车站附近一仗最为激烈。这一带由于紧靠铁路线，估计敌人从此处突围的可能性最大，我们做了重点防守。围城之初，我曾经带着参谋人员到担任该地区封锁任务的独六师利用夜间赴前线查看地形，与该师领导详细地研究了作战方案。独六师是一支老部队，战斗力比较强，加上做了周密的部署，部队警惕性高，这一仗打得很漂亮。那天，敌人采取小部队多方佯动，寻找我侧翼与结合部，然后集中主力重点出击。由于六日拂晓大雾，敌人进到距我警戒三、四十米才

被发现。敌人在其据点炮火的掩护下，每次以四、五十人为一队，轮番向我阵地进攻。当时，我担任防御的一线部队虽只有一个班，但非常沉着，顽强还击，直到主力赶到，双方激战至下午一时，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共毙伤俘敌一千余。这是敌人最大的一次突围。此外，敌人还组织了几次中等的试探性突围，均被我打退。

八月十六日，围城指挥所召集军事工作会议。根据总部指示，压缩部署，进一步困锁敌人。这时，我围城指挥所已改称第一兵团。司令部亦向前压缩至距长春城二十里的四家子村。为了防止长春敌人突围，又调集了十几个独立师为二线兵团，布置在双阳、伊通、公主岭一线以及梅河口至开原一线，把长春重重围住，从而也保证了锦州战役的顺利进行。在这前后，我围城部队还组织了一些出击。如独七师袭击小南屯敌骑一旅，十二纵反击恩慈医院守敌等战斗。据九月份的统计，在围城三个多月中，共进行了大小战斗三十余次，毙伤俘敌近三千名。

九月，北宁线上的锦州战役打响了。我军进军的号角震撼了蒋家王朝，也使长春孤城中的敌人濒临绝境。为保证锦州战役的胜利，我东北各主力纵队均调集前线，六纵、十二纵也奉命调集通江口、开原一线。这时围城一线部队只有六、七、八、九、十和后调来的独十一师六个独立师，任务更加艰巨了。根据总部指示，为配合主力北宁线上作战，我围城部队的任务是继续压缩部署，夺取一切能夺取

的敌人之外围据点、牵制迷惑长春守敌。如敌突围，坚决在运动中消灭之；如敌继续固守，则选择突破口，构筑工事，为正式攻取长春作充分的准备，以待锦州战役结束后，主力回头打长春。为此，我围城各部队作了多种作战方案。十月二日，围城指挥所在四家子召集师以上干部会议，详细研究了部署。这时，城内情报源源不断地送来。我们获悉：蒋介石命令郑洞国率部突围；郑洞国在洪熙街查看地形；敌人连续几夜演习夜行军，急行军；敌人每人发了三天军粮；敌军官家属集中于海上大楼；敌将走不动的马都杀掉……这些重要情况说明敌人有突围的明显迹象。于是，我十万围城部队立即紧急动员，准备战斗。不久，又获悉，敌人估计我主要防守西南口中长路，于是将突破口选在长春以西大房身机场方向，企图以最精锐的部队新三十八师作试探突围。对这一情况掌握后，我第一兵团司令部又作了几个战斗方案，并交由前线部队进行充分的研究讨论。在讨论中我提出，估计敌人这次出来的兵力不会少。我们的“刀子”插得深一点好？还是浅一点好？如果插得深，把部队全调进去，固然可以多截击敌人。但是，就象流水一样，突然截住了，冲力大，漏掉的可能要多得多。如果浅一些，梯次配备，从侧西打击敌人，一个梯次消灭一部分敌人，放过一部分敌人，由第二个梯次再从侧面伏击。余下的敌人留给第三梯队去解决，这样也许更好一些，自己伤亡也会小一些。经过大家反复讨论，同意了我的意见。

这样，我们部队在几十华里的区域内，分三个梯次部署展开。十月七、八两日，敌全副美装的三十八师向我独七师阵地全力进攻，企图占领大房身机场，进而在增援部队或飞机接应下突围。经我数次各个击破，进展甚慢，气势渐衰。遭此迎头痛击后，长春守敌便缩了回去。突围计划遂成泡影。此时的长春，飞机不能降落，步兵不能突围，内外联系中断，真正成了一座死城。

卡住敌人的脖子

围困长春的斗争，是一场非常复杂的、全面的斗争。除了严峻的军事斗争以外，最尖锐和直接的斗争还表现在经济斗争上。实行经济封锁，是我围困长春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军在迎往长春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等一切生活资料和牛、马入城，严禁一切走私分子入城，重点实行粮食封锁。我们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如同卡住了敌人的脖子，把十万敌军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困守孤城，历来为兵家所忌。十万守军要在城内生存下去，等待蒋家王朝的接济进行反击，吃饭活命是起码的条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敌人费尽了心机。围城之初，他们经常在城外的村庄抢粮检柴储存起来。长春城外方圆三、四十里的中间地带，无一村庄幸免，许多房屋拆得只

剩四壁，房上的草都被拉进城去喂马。随着我围城部队日益向前压缩部署，距敌越来越近，敌人外出抢粮、拆房，只要被我军发现，即毫不留情地打回去，敌人不敢出城，只好依靠空投。开始，敌长春警备司令、新七军军长李鸿还安慰部下说：“没有关系，没柴烧拆房子，没粮吃有空投。”随着旷日持久的围困，执行空投任务的敌机，遭我炮兵和高射机枪的射击，有时来不及空投，就掉转机头仓惶回逃，有时被迫漫无目标地乱投。很多粮食都落在我军阵地或封锁区内。这些南方的大米，四川的榨菜、猪牛肉罐头，均成了我军的美味佳肴。当时，我们侦察到敌人专门设立了一个空投指挥所，由敌兵团参谋长杨友梅任总指挥，统一分配投入城内的粮食等物资，规定大部分供给新七军。由于蒋军官兵饥饿难忍，谁抢到谁就私留分吃，加深了蒋军内部嫡系与非嫡系军队之间的矛盾，甚至械斗。后来，郑洞国不得不亲自签名出告示说“倘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自抢藏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足见矛盾之尖锐。据当时美联社的一些“专家”分析，空投粮食要二十架飞机，每天飞行两次，才能供上长春的需要。可是，最多时每天只有十二架飞机，以后每天三、四架，再以后到每周三、四架，阴天下雨就难以为继了。因此，空投粮食只能是杯水车薪。郑洞国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最头疼的问题就是缺粮”。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只有加倍的搜刮长春市五十万无

辜居民，组织了军政警合一的“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将城内的粮食、包括麸子、糠粃、豆粉等，都搜刮殆尽。由于粮食奇缺，城内的粮价飞涨，下面的统计表是当时每斤高粱米的涨价的情况。

六月二日	四万元
六月二十三日	二十二万元
七月十四日	八十万元
七月二十八日	三百三十万元
八月一日	七百二十万元
八月十八日	二千三百万元
九月十日	二千八百万元(均为东北流通券)

仅在六月到九月的三个月，粮价就上涨了七百倍。后来，粮价再涨，粮市上已无粮食可卖，有价无市了。据投诚的蒋军官兵讲，城里连青草都要一捆钞票买一捆。一个金镏子只换一个馒头。围城期间，我们密切注意城内的动向，经常派侦察员潜入侦察，或者向逃出的老百姓了解情况。因为经济情况是敌人军心情况的寒暑表，也是我们决定围城工作的各项部署的主要依据之一。

为了减轻城内缺粮食的压力，缓和矛盾，敌人还采取了恶毒的“杀民养兵”的政策。他们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这对我部队压力很大。我们既要执行封锁任务，又要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既要粉碎敌人恶毒的阴谋，又不能让或千上万的百姓饿死。这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政策问题。

当时，在第一线担任封锁任务的干部战士，十分同情这些出来的群众，把自己的饭拿出来给群众吃。后来，出来的群众越来越多，靠一线部队自己的力量已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指挥部就开会研究，决定设立难民处理委员会。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划地收容难民、疏散难民。开始，我们工作缺乏经验，给饿苦了的群众吃饭没有限制，结果有些群众在久饿之后突然进食过多，胃肠负担不了，胀死了。接受教训，以后收容的难民就先吃两天稀饭，逐渐增加饮食，避免了类似情况的发生。对收容的难民，及时的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单位还利用难民回去做侦察或瓦解散军的工作。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四千吨救济粮，六亿元救济金及五百斤食盐。为了救济长春市的难民，减轻当地解放区群众的负担，我们的战士迅速自觉地开展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的运动。夏季，部队积极组织、帮助抢种荞麦、蔬菜，开展生产自救；秋季，积极帮助人民群众抢收粮食，保卫秋收。人民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深深痛恨蒋匪军，深深热爱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他们纷纷组织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封锁长春。儿童团员站岗放哨查路条，青壮年缉私、抓坏人，昼夜巡逻。这样，军民筑起铜墙铁壁，努力做到一粒粮、一根草都运不进长春城。

敌人的阴谋失败了，饥饿降临在蒋军自己头上。敌军

从六月份开始，正规军每人每日定量一斤五两，高粱大豆各半；七月一日减少十分之四；八月初，除新七军三十八师每周还偶尔能吃一顿大米饭，六十军一八二师用三分之一高粮米掺大豆吃外，余下的四个正规师都发粮代金，由各连自己去买，买到什么吃什么，每人每天的菜金只够买一斤黄瓜，只能熬些菜汤喝。至于地方保安部队，只能靠抢了，抢到什么吃什么。这样，困守长春的敌军内部，除了共同面临饥饿危机外，正规军中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正规军与地方军之间矛盾，再加上广大受害居民与蒋军的矛盾，都异常地尖锐起来，人心浮动，朝不保夕。敌人惊呼“长春象一个断了线的风筝”。

线的确是断了，是被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掐断了；是被十万大军筑起的钢铁防线掐断了；是被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铁臂合围掐断了。

“心战为上”

由于我实行了坚决的军事打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敌人内外交困，士气大跌，军心浮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又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六月二十八日，根据围城总方针，围城指挥所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肖华同志在会上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充分说明了政治攻势的

重要性。会议分析了长春守敌的特点：（1）部队复杂，有中央嫡系部队，云南滇系部队和土匪杂牌军改编的部队，彼此间互相矛盾，相互排斥；（2）断绝了陆上供援，孤点孤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随着时间延长，内部困难必会日益增长，士气也愈益低落；（3）经过我地下党的工作和敌我双方对垒接触的过程中，敌人对我军的政策已有不同程度的了解；（4）东北籍新兵多，归乡心切，盼望东北解放。会议指出，我军必须利用这些矛盾，强化政治攻势，达到削弱敌人的斗志，瓦解敌人的战斗力，最后解放长春的目的。会议具体部署了政治攻势的任务，号召发动群众，创造多种生动、有力的形式瓦解敌军。

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攻势迅速在部队中展开。广大指战员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无比的智慧，创造了多种宣传形势。如广泛的阵地喊话。开始经验少，单纯用嘴喊，声音又小又容易暴露。后来，大家做土喇叭，利用各种掩蔽物，有的还发明了“弯形长话筒”，用长竹筒绑成弯曲的形状，一直通向敌人阵地前沿，既安全，效果又好。又如散发宣传品，部队创造了打宣传弹，或在护城河内放宣传木船等办法，将宣传品送到敌阵地上。有的缝制慰问袋，内装宣传品，开展过节送礼活动。还有的采取给敌人送饭，请敌人过来吃饭，将食品和宣传品同时送给敌人。这些办法效采都很好。我独八师的一个班长李凤春，为了宣传喊话、接逃兵，饭都顾不上吃，觉也顾不上睡，夜以继日地

工作，成绩显著。围城指挥所及时通报表扬了他的事迹，推动各部队群众性的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

强大的政治攻势涣散了敌人的军心，大量敌人逃出城来投诚。敌人为了抵制我军的政治攻势，不得不搞些反宣传。如组织“政工队”到阵地前沿骂阵，在部队实行“连坐法”等等，但终究抵挡不住正义的力量，逃亡投诚者与日俱增。开始，逃过来的多是土匪杂牌部队，正规军的较少，特别是新七军三十八师这个一贯妄自尊大的蒋军嫡系部队，逃亡投诚的更少。为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分析研究了敌三十八师的人员情况，针对该师多是关内人，思家心切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组织喊话。不喊让他们投降等刺激性的口号，而喊“你们是怎样来当兵的”，“你们的家庭、父母妻子在盼望你们”，“你们为谁卖命，死了又是为谁”，“长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没有前途了”，“你们出来，我们一定发路费，放你回家”等等内容。喊话效果显著。投诚的也日益增多。过来的士兵纷纷说：“你们喊别的都没有什么效果，就是一提家的问题，我们就流泪。”

在军事斗争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八月五日和十一日，我们发动了两次强大的宣传攻势，八月下旬，又开展了政治攻势突击周，大打政治仗，人人作宣传，个个想办法。领导上组织了两次大检查，利用自己办的刊物《围城简报》推广先进经验。各部队领导带头，从干部到战士纷纷去前沿对敌喊话。有一个部队的机枪班由于不能上前线，全班

自动捐献八月份的津贴给前线部队做瓦解敌军之用。我们还组织了城外的群众、老人、妇女、儿童以及长春城内逃出的难民做工作，利用蒋军家属和俘虏、投诚官兵对敌喊话，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我们在解放吉林时，俘虏了六十军暂二十一师的一个团长的老婆和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弟弟的老婆。我们对他们进行教育以后，派人送她们进城，后来还设法找到了李嵩弟弟的孩子，也送进去，给敌军内部以很大的影响。李嵩的弟弟感动地说：“共产党是自古以来最好的仁义之师，蒋介石使我妻离子散，共产党使我家人团聚”。这些对六十军以后的起义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城内敌人纷纷投诚，由土杂部队到正规军，由士兵到官佐，由徒手到拖枪，由个别到整班整排的投诚。我们在各阵地前沿设立了投诚官兵接待站，在我们敌工部设立总接待所，负责安置这些投诚官兵，愿意留下的就转到吉林后方留守处，愿意回去的发给路费，有些合适的对象就留下或派遣回去做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六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底，我们共接收投诚官兵一万三千七百余人，其中新七军三千七百余人，六十军三千八百余人，土杂部队六千二百余人。

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瓦解散军工作的同时，在另一条战线——即在敌军内部，尤其是对六十军上层军官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六十军原属滇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就派有几位共产党员在这支部队中工作，使其受到革

命的影响。一九四五年蒋介石强行收编这支部队以后，将他们送往东北战场打内战。党中央正确分析了敌人内部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的矛盾，精心布置了争取滇军起义的工作。据直接做这项工作的刘浩同志回忆，一九四六年四月，朱总司令、少奇同志亲自找他谈的话，作了如何争取滇军起义的具体指示，朱总司令还以滇军旧僚的身份，亲自给孙渡、卢浚泉、曾泽生写信，要他们发扬滇军护国的光荣传统，站在人民一边。刘浩受中央委托来到东北后，与在滇军中的我党地下组织接上关系，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将被俘军官中经教育表现较好的，以派遣方式放回城去做工作，如梅河口的战役被俘的敌一八四师团长张秉昌、李崢先等，就是这样有计划地放回去。九月二十三日，根据形势的发展，我第一兵团又召开了敌工会议，指出，今后政治工作的方针，除继续开展对敌猛烈的宣传攻势、大量瓦解敌人外，特别要注意做上层的工作，组织战场起义。制造里应外和的条件歼灭长春敌人。为加强策动六十军起义的工作，东北局还委派一九四六年五月海城起义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为我第一兵团副参谋长，同时派我党长期做滇军工作的刘浩、杨滨同志主持东北军区联络部前方办事处的工作。潘朔端利用各种关系给城内上层军官写了不少信。刘浩也化妆秘密进城做上层的工作，六十军中以孙公达同志为首的地下党组织，在此期间也积极工作，扩大影响，发展了一批党员。为六十军起义创造了条件。

回顾围困长春战役期间，部队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我军的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特别是在瓦解敌军工作方面是有所创新的。

兵未血刃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部署，东北我军出敌不意，首先在锦州摆开了战场。我军主力六个纵队，以雷霆万钧之力，扫清了锦州外围，逼进锦州城垣。十月十日，蒋介石急令郑洞国率部突围。长春守敌数次突围均遭我痛击而失败，自知突围已是飞蛾投火，即使有幸突出去，这支饿兵困军，也必在半途被我层层截击消灭掉，因而无心再做这种愚蠢的尝试。十月十四日，我对锦州发动总攻，经过三十一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范汉杰部十万余众。锦州大捷，引起东北战局的急剧变化。十月十五日，蒋介石在长春空投手令，要郑洞国立即突围，并以“如再迟延有失机宜，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裁判”相威胁。这种形势也加速促成了六十军的起义。

十月十四日，我军派遣入城的张秉昌、李峥先同志携带着曾泽生（六十军军长）、白肇学（六十军一八二师师长）、陇耀（六十军暂廿一师师长）的联名投诚信。来到我兵团敌治部所在地，敌治部主任唐天际与潘朔端、刘浩研究了

信的内容，认为比较可靠，便向兵团司令部报告。这时，我兵团司令部正在开会，研究布置打敌突围问题。会上对曾泽生的投诚信，有一部分领导同志持怀疑态度，认为曾泽生耍花招，以假降骗人，实质是想突围，主张不予理睬。刘浩认为，就他与陇耀等人的接触看，六十军在当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义是可能的，提出愿意冒险进去商谈起义。从当时的形势分析来看，我认为刘浩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不应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如果能争取六十军起义，对解放长春将有决定性意义。退一步说，如果他们以此为手段突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完全有力量把他们消灭。于是，我即与大家商定，一面把情况向东北局报告，一面派解沛然参谋长与刘浩一起去向张秉昌、李峥先转这了几点意见：对六十军起义表示欢迎，请曾泽生派正式代表出来商谈起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布置了防突围的准备工作。东北局接到我们的报告后，即回电示，应相信六十军是真起义。十六日夜间，六十军派暂廿一师副师长任孝中和一八二副师长李佐携带蒋介石十五日的空投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作为曾泽生的正式代表与我方商定起义的具体计划。唐天际向他们转达了兵团领导的意见。欢迎他们起义，起义后的待遇与解放军完全一样。对他们提出要参加打新七军的要求答复说：六十军被围时间已经很长，官兵们吃不饱，身体虚弱，不必参加解决新七军的战斗了，起义后即出城。曾泽生得知我军的意见后很高兴，

十七日使亲自与进城的刘浩一起出城，与我们最后商定防务交接计划。十七日午夜十二点，按照预定计划，我接防部队悄然进城，六十军同时撤出城外，开往九台休整。进城部队秩序井然，交接防顺利。天一亮，纵贯长春市南北的大同街以东地区便成了我们的天下。曾泽生起义后的当天，我与肖华在兵团司令部会见了他和部分起义将领。我说，你率部起义，我们竭诚欢迎。今后我们是一家人了。你们丝毫不孤立，前途是远大的。我们对待起义部队的政治、经济待遇和我们解放军一样，不受任何歧视。曾泽生军长说：我感谢共产党对我军四万余众的争取和挽救，得到生存，今后绝对服从命令，接受教育改造。我看曾泽生比较拘谨，就笑着说，你的思想上不要有什么顾虑，你打过日本人，还有战功呢，今后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都可以坦率地讲。一家人了，要情同手足，并肩革命。我和肖华与曾泽生军长在一起照了相，以后东北电影制片厂还来拍摄了《民主东北》的记录影片。在六十军开往九台的路上，起义官兵有的将帽徽扯下扔掉，有的索性将帽子都扔掉了。六十军开到九台后，我们派了慰问团去慰问，演《白毛女》、《血泪仇》等戏，启发起义官兵的阶级觉悟。大部分起义官兵表现是不错的，当然也有违纪现象。特别是地方土杂部队改编的暂五十二师，问题较多。我离开长春时，去九台看了这支部队。当对有部分同志主张，将五十二师缴械，或官兵分开。我回想改造红五军团时期的经

验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指示，认为这样做不妥，支持了一些同志主张教育改造的意见，并调整干部去掌握这支部队。当时要兵不要官的说法也传到曾泽生军长的耳中，他对我说，我的部队随你们调整，只是希望不要编的太散，我们师以上干部听从你们分配。我看他顾虑重重，即与他谈起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特别谈到北伐战争。我说，那时你在三军，我在二军，我们两个军是同路。那时我参加了国民党，还是师党代表。你们在抗日战争中打过日本人，有战功，我们国共两次合作。现在你参加了革命队伍，就更是一家人了。我们对于起义官兵都是有政策的。我们已作了决定，不久即会将部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要派政治委员来，你的这些意见我们都会考虑，请曾军长放心，不要有什么顾虑。以后，这支起义部队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都是好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六十军起义后，郑洞国的后院起火，长春守敌更是人心惶惶，朝不保夕。曾泽生起义时，曾想争取郑洞国和新七军一同起义，然而没有成功。六十军起义后，我们发动起义官兵利用各种相识的关系给新七军和敌指挥机关的官兵写信，促其举义。当时，中央考虑，郑洞国是东北“剿总”副司令，是黄埔一期生，所率是蒋军嫡系部队，又占据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大城市，争取其起义，对全国各大战场的蒋军官兵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有很大的意义。十月

十八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拟电报给郑洞国，指出：“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电报抄好以后，我们即派代表遣过关系送进城去。但这时，郑洞国还颇有一些“正统军人”的愚忠愚孝思想，不肯起义。然而防守长春而半部的新七军却已土崩瓦解了。其中下层部队，已经与我军直接接触了。在大同街两侧，有的部队与我军的电话线已经架通，有的官兵过来与我军一起吃饭，从上而下都要求放下武器，纵然其长官一再命令突围，已全然无人听命。这真是众叛亲离了。十八日，新七军派代表与我兵团洽降，达成了协议。十九日上午十时，按照预定方案，我军接收了长春市的西半部。至此时，长春市已全部解放，只有郑洞国与其卫队还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从当时的情况看，要以武力攻占达栋大接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为什么没有用武力解决呢？--是为了给郑洞国一个最后投诚的机会，避免生灵涂炭，对起义投诚的部队也是一个教育；二是照顾郑的部下的良苦用心——使郑洞国能“体面的投降”，其部下对我方代表提出以大楼为据点，“抵抗”一二日后再

降，要求我们发表“负伤被俘”的消息。因此双方商定二十一日晨四时郑洞国率其卫队投降。二十一日凌晨，我带着部队接近了中央银行大楼准备接受郑的投降。四点钟，突然枪声大作，中央银行内向外无目标地射击，枪打得很高。当时潘朔端和我的秘书罗钰如正乘坐我的吉普车到前方来，我的司机高桥还被流弹击中了腿。天亮时分，从沈阳方向来了几架飞机，在高空绕了几圈后就回去了。不一会，枪声停止，敌人打出白旗，郑洞国率部投城。长春最后一座敌据点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事后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这样，郑说，“不得不从长计议”。据说，枪响时，郑洞国打开报话机，向蒋介石作了“曾叛李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的最后交代。

就这样，敌我双方在对持了五个月之后，在我军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兵未血刃地结下了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城下之盟。说来也巧，郑洞国所率领的守城部队是国民党第一兵团十万人，而我围城部队的番号和实力也恰好是第一兵团十万人。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色彩。郑洞国率部投诚后的第二天，我与肖华在四家子兵团司令部会见了。谈话中，我们对他放下武器表示欢迎，并希望他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些事。郑洞国当时十分颓丧，心灰意冷地表示，从此解甲归田，做老百姓。会见以后，我们以丰盛的饭菜招待了他。饭后，他向我们道谢说，几个月来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菜。据我们

的同志目睹，接收中央银行时，郑洞国的桌子上放着吃剩的马骨头。足见当时长春的困境了。

长春围困战役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是我军采取“久困长围”的方法和平解放具有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的第一个成功的战例。这一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撤退长春，回兵沈阳，全力增援锦州葫芦岛的计划，彻底拔掉了蒋介石安在东北我军腹地的一颗钉子，使我军能适时集中全部力量进行辽西会战，从而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这一战役的胜利，还为我军和平解放大城市提供了军事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经验，也为据守其他大城市的国民党官兵指出了一条通向光明之路。

长春和平解放，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部署，长春和平解放，是我围城部队正确执行中央军委、东北局“久困长围”的指示，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攻势三管齐下的结果，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是值得总结的。长春和平解放，归功于在敌军内部冒着生命危险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他们不怕牺牲，艰苦工作，掌握时机，与围城部队里应外合，成功地策动了六十军起义。长春和平解放，还应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忘我支援。人民群众不但为我们提供后勤保障，还自觉地参加部队的封锁工作。同时曾泽生将军深明大义，毅然起义，为长春解放做出了贡献，郑洞国将军放下武器，率部投诚，也受到人民的欢迎。我们对一切起义

和投诚的国民党军的官兵，都是以诚相待。只要是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过好事的人，人民都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长春解放后的第三天，我们即接到总部的命令，日夜兼程南下，去参加沈阳外围战役。全东北解放后即率部队入关，奔赴平津战役的战场。